

“狼烟”考

李正宇

“狼烟”一词的出现及流行

燃烽火以报警，西周时期已有。
《史记·周本纪》载：

幽王为烽燧、大鼓，有寇至
则举烽火。

“烽火”是个统名，分指烟焰及火光，即《墨子·号令篇》所谓“昼则举烽，夜则举火”。“烽火”又称为“烽燧”，《史记集解》引《纂要》云：“烽主昼，燧主夜。”《昭明文选》卷四十四司马相如《喻巴蜀檄》李善注引曹魏张揖说：“昼举烽，夜燔燧。”说明白天燃烟为号称为“烽”，夜间燃火为号称做“燧”。唐代《烽式》规定，警烽的传递速度“一昼夜须行二千里”（宋·曾公亮等撰《武经总要前集》卷五《烽火·行烽》条引）。在电讯尚未发明的古代，烽火传警最为迅速捷疾，所以作为一项军事报警方法，一直沿用到清代，长达两千多年。

烽火燃放的炷数与传烽办法皆有一定的规定，这种规定被称为《号令》。先秦诸侯国各有自己不同的规定，《墨子》卷十五《号令》及《杂守》载有战国时期鲁国的烽火号令；汉代

谓之《烽火品约》，《烽火品约》由各边郡自订，不与他郡尽同；唐代谓之《烽式》，由兵部制定，颁发全国。则知烽火号令到唐代方趋统一。

东汉末期，出现了与“烽火”同义的新词“烽烟”。《三国志·魏志·袁绍传》引《汉晋春秋》载：审配献书于袁谭（袁绍之子）曰：“烽烟相望，涉血千里。”此词后代继续沿用。到晚唐时期，方出现与“烽火”、“烽烟”同义的新词“狼烟”。

文献中出现“狼烟”一词，以晚唐杜牧《边上闻鸣笳三首》为最早。今略依作者生年先后，举例于下：

何处吹笳薄暮天，塞垣高鸟
没狼烟。（杜牧：《边上闻鸣笳三首》，《全唐诗》卷五二五）

鸡塞谁生事，狼烟不暂停。
（李商隐：《寄太原卢司空三十韵》，《全唐诗》卷五四一）

铁马半嘶边草去，狼烟高映
塞鸿飞。（赵嘏：《降虏》，《全唐诗》卷五四九）

下营看斗建，传号信狼烟。
（刘驾：《塞下曲》，《全唐诗》卷五八五）

狼烟堡上霜漫漫，枯叶飘风

天地干。(温庭筠:《遐水谣》《全唐诗》卷五七五)

三道狼烟过碛来,受降城上探旗开。(薛逢:《狼烟》,《全唐诗》卷五四八)

鸟道见狼烟,元戎正急贤。(顾非熊:《送李廓侍御赴剑南》,《全唐诗》卷五九)

此处游人堪下泪,更闻终日望狼烟。(顾非熊:《出塞即事》,《全唐诗》卷五九)

狼烟篝火为边尘,烽候那宜悦妇人。(周昱:《幽王》,《全唐诗》卷七二八)

风卷平沙日欲曛,狼烟遥认雁飞群。(裴羽仙:《哭夫二首》,《全唐诗》卷八一)

狼烟作阵云,匈奴爱轻敌。(僧贯休:《古塞下曲》,《全唐诗》卷八二七)

自从宇宙充干戈,狼烟处处薰天黑。(敦煌曲子词:《菩萨蛮》,罗振玉旧藏敦煌唐写本《春秋后语》卷背)

经乱不输乡国税,去时繁盛起狼烟。(《番禾县》敦煌P.2672号写卷,作于咸通年间)

晚唐之前,文献中只说“烽火”、“烽燧”、“烽烟”,绝不见“狼烟”一词,表明中唐及其以前无“狼烟”之说,“狼烟”一词的出现及流行,不过是晚唐(九世纪)以来的事。而晚唐时期“狼烟”一词的使用,又基本上局限在诗词之类作品中,其他文体如赋、论、疏、说、传记、杂文中,则

一概不见。表明这一时期“狼烟”一词只是活跃在抒写性灵的诗体之中。

五代时期“狼烟”一词在中原地区其他文体中方始出现,然而所见亦仅以下四例:

1.后蜀杜光庭《皇太子为皇帝修金箓斋词》:“灾缠永息,禎瑞常臻;夙历克调,狼烟不警。”

2.《风穴禅师(896~973年)语录》:“问:狼烟永息时如何?师曰:两脚捎空。”

3.五代《殷文圭集注》:“狼烟,诸侯时,中国有事烧狼粪为烟,以达诸侯。”

4.《册府元龟》卷一百二十五,后汉天福十二年:“是岁二月,帝率兵将下井陘……乃留步卒一千戍之,备其不虞。时以虏还,守者怠,为虏所侦,潜来攻我,我众惊溃,虏乃焚其并邑,一日之中,狼烟百余举。”

同中原地区很少使用“狼烟”一词的情况相比,五代时期“狼烟”一词在敦煌却被广泛用于诗、赞、俗曲、疏启杂文之中。举例于下:

敦煌用于诗、赞者,如:

1)P.5026《阙题》诗:“烟(燧)煌西裔是临边,四塞清平扫朗(狼)烟。令公加节拾万年,沙府国境小长安。”

2)P.4638《曹良才画像赞》:“挥戈塞表,狼烟₁静于沙场;抚剑临边,只是输诚而向国。”赞词又曰:“挥戈定塞,₁静狼烟。”

3)P.3718《后晋故归义军节度押衙知敦煌郡(乡)务李润晟邈真

赞》：“生之(知)异俊，忠孝两全；挥戈塞表，静狼烟。”

用于时调俗曲者：

1) P.4976 后晋天福元年(936年)左右曹元德时敦煌《驱傩儿郎伟》：“因兹狼烟殄灭，管内休罢刀枪。”

2) P.4011 后晋天福四年(939年)左右曹元德时敦煌《驱傩儿郎伟》：“亲领精兵十万，围绕张掖狼烟。”党(当)便充(冲)山进跨，活捉猓狼烟。”

用于疏启杂文者：

1) P.2945 《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某某书状集》(与凉州书)：“抚镇而羌龙畏威，权谋而戎夷自(至)廓；使风烟不经于朔野，狼烟混灭于兰山。”

2) P.2704 《后唐长兴五年(934年)二月九日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回向疏》：“狼烟熏(罢)扫，励(病)疾蠲除；福庆咸来，灾殃殄灭。”

3) P.4046 《后晋天福七年(942年)十一月廿二日归义军节度使曹元深舍施回向疏》：“狼烟永灭，戈甲不兴；痍疾消除，长闻喜庆。”

4) S.2687 《河西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及夫人翟氏回向疏》：“狼烟息焰，千门快乐而延祥；塞虏无喧，万户获逢于喜庆。”

5) P.3490背 《张某乙修佛刹功德记》：“狼烟罢灭，小贼不侵。”

从北宋以来，“狼烟”一词在中原地区才被广泛用于诗、文、词、赋，其例繁多，勿烦列举。

古今关于“狼烟”的荒唐释义

最早对所谓“狼烟”作出解释者为晚唐段成式(827~863年)。他说：

狼粪烟直上，烽火用之。

(《酉阳杂俎前集·毛篇·狼》)

他首次将“狼烟”解释为狼粪燃起的烟，并说狼粪烟升腾直上，所以施放烽火用狼粪作燃料。段氏之说，立意新奇，颇能引人驰骋遐思，故世人乐于接受并从而附和之。于今所见最早的附和者为五代《殷文圭集注》(已见前引)。

宋人则沿袭段成式之说并进一步加以发挥，如北宋钱易《南部新书》卷八云：

凡边疆放火号，常用狼粪烧之以为烟，烟气直上，虽烈风吹之不斜。烽火常用此，故谓“堠”曰“狼烟”也。

钱易除了上承段成式“狼粪烟直上”一说之外，进一步造出“虽烈风吹之不斜”的夸张说法。钱易之后，北宋陆佃在《埤雅》卷四“狼”条中云：

古之烽火用狼粪，取其烟直而聚，虽风吹之不斜……或曰：狼骍胁、肠直，其粪烟直，为是故也。

这里，陆佃在转述段、钱之说后，又进一步解释狼粪烟直的物理根据是由于“狼肠直”。此外，他在谈骆驼时还说骆驼粪亦“烟直上如狼烟”(《埤雅》卷四“驼”条)。读者稍加思索，都会发觉上引言论之荒唐。世界上哪里有“直肠”走兽？其粪燃烟怎么可

能“烈风吹之不斜”呢？

世人皆知狼肠一如狗肠，屈曲盘绕，长达数丈，何得直通上下？至于狼粪燃烟是否直上而风吹不斜，稍作实验，即可确知其言之谬。上世纪80年代，笔者在敦煌戈壁中进行地理考察时，曾特意收集干燥狼粪点燃实验，其烟遇风而散，既非聚而不散，更非风吹不斜。陆佃关于狼粪“烟直而聚”以及“风吹之不斜”的说法，若非自己信口开河，则当是道听途说，以讹传讹。

世界上不顾事实、信口为说的事例并不少见，不值得大惊小怪。但值得惊怪的是，千百年来读段、钱、陆之文者众矣，皆“日读误书而不知”，曾不一疑，反而盲从附和。且举数例于下。

南宋罗愿《尔雅翼》卷十九“狼”条：

狼肠直，故作声诸窍皆沸；
边庭候望设狼烟，以其直上，风吹不斜也。

向以科学巨著名世的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卷五十一“狼”条亦云：

狼……其肠直，故鸣则后窍皆沸，而粪为烽烟，直上不斜。

被许为“可资博识而利民用”的明代方以智《物理小识》卷十“狼”条，同样重复着陆佃的谬说：

狼肠直，故边塞以狼矢为烟。

南宋以降，从同陆佃之说者，尚有叶廷珪《海录碎事》、元代熊忠《古今韵会举要》、阴劲弦、阴复春《韵府

群玉》，明代陈耀文《天中记》、毛晋《陆氏诗疏广要》、叶子奇《草木子》、冯复京《六家诗名物疏》、徐光启《新法算书》，清代陈元龙《格致镜原》、《御定分类字锦》、《御定佩文韵府》等，不烦悉举。连康熙皇帝令“官府吏民亦有所遵守”的《康熙字典》，也具引陆佃《埤雅》之文云：

古之烽火用狼粪，取其烟直而骤，虽风吹之不斜。

著名的古代军事家同样信以为真，视狼粪为烽火必不可少的最佳燃料。明戚继光（1528～1587年）《纪效新书》卷十七《守哨篇·草架法》云：“伏睹祖宗墩法举狼烟，南方狼粪既少，烟火失制；拱把之草，火燃不久，十里之外，岂能目视！”

今世词书亦沿袭其说而无异词，其例无烦悉举，仅举二例于下：

权威性词书可举《辞源》为代表：该书《犬部·狼》字“狼烟”条云：“狼粪之烟，设防地区用作军事上的报警信号。相传古之烽火用狼粪，取其烟直而聚。”

普及性词书可举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《现代汉语小词典》为代表，该书同样说狼烟是“古代边境报警时烧狼粪起的烟”（《现代汉语小词典》1998年第二版）。

关于“狼烟”，古代典籍及当代词书，除上引之类的解释之外，别无他解。段、钱、陆氏之说影响之大及其深入人心的程度，可以不言而喻。所谓“狼粪烟直而聚，古烽火用之”这类的荒唐话，千百年来竟无一人起而

驳正 这在我国学术史上堪称眯目糊心事例的突出典型。

“狼烟”并非“狼粪”所燃烟

从文献记载可知 烽火台白日放烟 ,用杂草、野蒿及杂灌木如胡桐、红柳、梭梭之类。唐兵部《烽式》载:“每岁秋前,别采艾蒿、茎叶、苇条、草节,皆要相杂,为放烟之薪。”据《武经总要前集》卷五“烽火”条转引)今敦煌境内汉唐烽燧遗址多处见有此类枯木杂草堆积,今人称之为积薪堆(图1)。

黑夜则举火,举火用苇茆。唐兵部《烽式》载:“烽火之法,应火炬长八尺;檣上火炬长五尺,并二尺围,干苇作薪,苇上用干草节缚。”(同上转引)敦煌汉玉门关外当谷燧南侧保存有四垛汉代茆薪垛,其中两垛较为完好,一垛虽已倒伏倾斜,仍可见其码摆整齐,由于长期泛碱,胶结坚固,看似化石(图2)。

在敦煌玉门关外,有8座烽火台处发现遗留有汉代燃火所用茆薪,其中一处多达16垛。这些茆薪垛都是用干燥的苇秆捆扎成束,



图1 敦煌凌胡燧积薪堆



图2 看似化石的汉代茆薪垛



图3 搬迁到兰州甘肃省考古所院内的敦煌汉代典型茆薪垛

每束径约20厘米,长约2米。苜蓿垛的码摆方法,是在底层横排胡杨木为垫,在胡杨木上分层叠放苜蓿,一层横置,一层纵置,交错叠压。(图3)

敦煌存留的苜蓿垛皆属汉代遗物,故与唐《烽式》规定的火炬束的规格“长八尺”或“五尺”、“并二尺围”有所不同。但敦煌存留的积薪堆和苜蓿垛足以表明:汉唐时代,边地烽火放烟用杂草野蒿之类,举火用苜蓿束。居延汉简及敦煌汉简中亦多有此类相关的记载。

若依段、钱、陆说施放烽烟用狼粪,那么敦煌及居延地区诸烽燧遗址当有狼粪堆积,汉简中亦当有狼粪燃烟的有关记载。而实则无论是居延地区、敦煌地区还是罗布泊地区,诸烽燧遗址都从未发现有狼粪堆积;居延汉简、敦煌汉简及罗布泊地区汉简中也从来不见有用狼粪燃烟的有关记载。

古时烽燧遍布全国,仅今敦煌市境内已经发现的古代烽火台及其残址即达130多座,估计全国不下数万座。这么多的烽火台,除了有警时须施放烟火之外,无警亦需每日施放“平安火”。杜佑《通典·守拒法附·烽台》条:“每晨及夜平安,举一火。”姚合《边词》:“沿边千里浑无事,唯见平安火入城。”若用狼粪,恐每座烽燧皆需蒙狼数百以聚其粪,不然的话,何从遽得如许之多的狼粪以供随时之用?由上所述,可知段成式及陆佃等人燃烽火用狼粪之说无稽。

放烟欲使远处得见,当然要求烟柱上冲、风吹不斜。但办法并不是燃烧所谓“烟直上”的狼粪。古代文献明确记载,使烽烟直上的办法是使用烟灶、烟囱。

一是在烽火台下面建烟火灶。唐《烽式》载:“置烽之法:每烽别有土筒四口……其烟筒各高一丈五尺,自半以下,四面各间一丈二尺,向上则渐锐狭。造筒先泥里,后泥表,使不漏烟。筒上着无底瓦盆盖之,勿令烟出;下有乌炉灶口,去地三尺,纵横各一尺五寸,着门开闭。其乌炉灶门用木为骨,厚泥之,勿令火焰烧及。”烟灶内的燃烟,通过高高的烟突(烟囱)直冲向上,而不是段成式、陆佃等人所说的“烟直而聚,风吹不斜”的狼粪烟。

二是又在烽火台上建“突灶”。当敌人攻入烽火台下,无法利用台下烟灶放烟时,则使用烽火台上的烟灶放烟。《通典·守拒法附》载:“烽台……台高五丈,下阔二丈,上阔一丈,形圆;上建圆屋覆之……屋上置突灶三所……并以石灰饰其表里。”在五丈高的烽火台上燃烟,同样可使远处得见。

这里也要补充说明一点:笔者在指出“狼烟”并非特指狼粪所燃之烟的同时,并不排除烽烟燃料中可以杂有狼粪。唐李筌《太白阴经·烽燧台篇》载,烽火台上须置“炮石垒,水停,水瓮,生粮,干粮,麻蘗,火钻,火箭,蒿艾,狼粪,牛粪”。《通典·守拒法附·烽台》所载同。唐《烽式》

亦云：“在烽贮备之物，要柴藁、木材，每岁秋前，别采艾蒿、茎叶、苇条、草节，皆要相杂，为放烟之薪；及置麻蕴、火钻、狼粪之属。《武经总要》载宋代制度亦于烽台上‘安火筒，置水罍、干粮、麻蕴、火钻、蒿艾、狼粪、牛羊粪’。在戈壁滩上，凡是可以燃烟的东西，包括红柳、胡桐、杂草、蒿艾，当然也包括狼粪、牛羊粪及其他动物干粪等，都可以杂取兼储以备，但绝非独用狼粪而已，也不是以狼粪为主要燃料。

“狼烟”词义正论

“狼烟”既然并非特指狼粪所燃之烟，那又为什么被称为“狼烟”呢？这需要从出现“狼烟”一词的时代局势谈起。

唐自高宗以来，一直陷入争斗的漩涡中。先是突厥频燃战火；天宝以来又有范阳节度使、突厥胡人安禄山、史思明等的叛乱，兵连祸结，首尾九年（755～763年），把一个好端端的盛唐帝国拖得精疲力竭，凋弊不堪；安史之乱尚未平息，吐蕃又起衅于西北，连陷鄯、武、叠、宕、秦、渭、洮、成、河、兰、岷、廓、临、原、会、凉及西南的松、维、保等十九州郡，百姓惨遭蹂躏。公元763年，吐蕃大军一度攻入长安，伪立广武王李承宏为帝；次年（764年），朔方节度使、铁勒人仆固怀恩又叛，勾结吐蕃、回纥攻奉天、醴泉、鄜州、泾阳；大历元年（766年），吐蕃西陷甘、肃二州，东围灵州，京师为之戒严。此后，吐蕃

一直取攻击态势，西陷瓜、沙、伊、西、北庭、龟兹、于阗，又东扰灵、盐、庆、银、麟、泾、鄜等州，唐朝半壁河山沦于吐蕃。在连年战火中，突厥、吐蕃、回纥军队烧杀抢掠，残酷荼毒。如大中四年吐蕃军阀论恐热“大掠河西鄯、廓等八州，杀其丁壮，剽刖其羸老及妇人，以槊贯婴儿为戏，焚其室庐，五千里间，赤地殆尽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四十九唐宣宗大中四年八月条）如此暴行，过于豺狼。难怪时人称之为“狼蕃”（敦煌曲子词有“早晚灭狼蕃，一齐拜圣颜”之语）。

却巧突厥是以“狼”为图腾；旗纛之上施金狼头，侍卫之士谓之附离，夏言亦狼也（《周书·异域·突厥传》）；回纥（回鹘）则与突厥同俗，同样以狼为图腾；吐蕃虽不以狼为图腾，而其地则属狼星分野（《晋书·天文志上》说：“狼为野将，主侵掠。”《旧唐书·天文志下》载：“今之西蕃、吐蕃、吐谷浑及西南徼外夷，皆狼星之象。”天宝以来数十年间，吐蕃攻城掠地，烧杀抢掠，其豺狼般的贪婪与残暴，历历在目，元稹《缚戎人》道：“天宝未乱前数载，狼星四角光蓬勃。中原祸作边防危，果有豺狼四来伐……半夜城摧鹅雁鸣，妻啼子叫曾不歇……少壮为俘头被髡，老翁留居足多刖。乌鸢满野尸狼藉，楼榭成灰墙突兀。”诗中正是将“狼星”与吐蕃与“豺狼”加以意象沟通。但贪婪和残暴，并不只是吐蕃侵略军的特征，同时亦为突厥、回纥侵略军所共有，故时人一例视同虎狼，晚唐裴羽仙《哭夫》二首道：“风

卷平沙日欲曛 狼烟遥认虎狼群。’又说“良人平昔逐蕃浑，力战轻行出塞门”，诗中的“虎狼群”即指入侵的“蕃、浑”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二十一唐肃宗乾元二年七月条载：“仆固怀恩继至，光弼引坐与语。须臾，闾者白：‘蕃、浑五百骑至矣。’”胡三省注云：“蕃、浑，谓诸蕃种及浑种。”正是指称吐蕃、回纥侵略军。“狼烟遥认虎狼群”是说遥见烽烟，不用说即知是“蕃、浑”袭来，同李商隐诗“鸡塞谁生事，狼烟不暂停”，说战端无非是边地部族生事，两者同旨。

战火既由虎狼般的“蕃、浑”燃起，于是取一“狼”字涵盖“蕃、浑”，用一“烟”字代指战火烽烟，二字合铸成“狼烟”一词来表示蕃、浑燃起的战火。这样，“狼烟”一词便诞生了。看来，“狼烟”二字即“蕃、浑燃起的战火”的凝缩语。如此解读，既为“狼烟”一词作出了诠释，也为“狼烟”一词出现的契机缘由找到了着落。

五代以来，“狼烟”词义渐渐泛化，超出了“蕃、浑燃起的战火”这一特定含义的限制，逐渐变成了战乱的泛指代称，如前引五代《曹议金回向疏》“狼烟罢扫，疠疾蠲除”及今所谓“伊拉克狼烟再起”中的“狼烟”皆是其例。此外，又进而衍生出“较胜”、“竞争”之义，如近时报刊所谓“春节促销起狼烟”者是。

“狼烟”一词既有早期（晚唐时期）的特定含义，又有后来的泛化含义。而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等当代辞书及教科书上用“狼粪所燃烟”来解释

“狼烟”，有必要重新斟酌。

2000年12月《国学网站·学术家园》载林染先生《为“狼烟”正义》一文，除赞同余说外，本文基本观点，早在1997年新华社记者刘伟的访谈中已略作披露，又提出“狼烟”一词同古人将匈奴、突厥、吐蕃等少数民族统治者称为“狼主”，其兵称为“狼兵”有关。林染先生此文还被选入大学本科全国通用教材《写作》书中，人民教育出版社于2003年9月出版。但林染先生此说却有失考证。检诸文献，“狼兵”一词起自明代。《明史·兵志三·土兵乡兵》条：“卫所之外，郡县有民壮，边郡有土兵……湖南永顺、保靖二宣慰所部，广西东兰、那地、南丹归顺诸狼兵。”又同书卷一百六十六《山云传》：“正统二年（1437年）上言：‘浔州与大藤峡诸山相错，瑶寇出没，占耕旁近田。左右两江土官，所属人多田少，其狼兵素勇，为贼所畏。若量拨田州土兵于近山屯种，分界耕守，断贼出入，不过数年，贼必坐困。报可。嗣后东南有急，辄调用狼兵，自此始也。’明代以前尚无“狼兵”之说，而明代所谓的“狼兵”，乃指侬、侗等西南少数民族“土兵”，与“匈奴、突厥、吐蕃”了不相干；至于“狼主”一词，更晚出于清代小说家笔下。试问晚唐时期已经出现的“狼烟”一词，何得取资于数百年后始有的“狼主”、“狼兵”之说而化铸新词？其说失诸根柢，不足为训，亦应加以澄清。

（作者单位：敦煌研究院）